

小于一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 著

黄灿然 / 译

LESS
THAN
ONE



GREAT
ESSAYISTS

大师批评译丛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于一

LESS
THAN
ONE

小于一

LESS
THAN
ONE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 著
黄灿然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于一 / [美] 布罗茨基 (Brodsky, J.) 著; 黄灿然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339-3960-1

I. ①小… II. ①布… ②黄…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②文学评论—美国—现代 IV. ①I712. 65 ②I712.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592 号

原书名: Less Than One

作者: Joseph Brodsky

Copyright © 1986 by Joseph Brodsky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123 号

小于一

作者: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 黄灿然

责任编辑: 曹洁 郭贤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插页: 5

字数: 331 千字

印张: 13. 875

书号: ISBN 978-7-5339-3960-1

定价: 45.00 元 (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纪念父亲和母亲
纪念卡尔·雷·普罗弗

心并不死去,当我们以为它应会死去。

——切斯瓦夫·米沃什《献给 N. N. 的哀歌》

目 录

小子一	001
哀泣的缪斯	026
钟摆之歌	042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056
在但丁的阴影下	077
论独裁	094
文明的孩子	102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 诂文	121
自然力	131
涛声	137
诗人与散文	149
一首诗脚注	165
空中灾难	232
论 W. H. 奥登的《1939 年 9 月 1 日》	262
取悦一个影子	309
毕业典礼致词	333
逃离拜占庭	340
一个半房间	387

小于一

1

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纠正记录(根本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是未被歪曲的),而主要是为了一个平常理由,也即作家为什么写作——刺激语言或被语言刺激,并且这一回是被一门外语。我所记得的那么一点点,又因为用英语来回忆而缩得更小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 1940 年 5 月 24 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在那些庄严的布满痘疤的建筑物表面背后——在旧钢琴、破地毯、沉重铜框里蒙尘的油画、围城期间被铁炉消耗掉的家具残余(尤其是椅子)中间——一种微弱的生命正开始发出微光。我记得,当我上学途中经过这些建筑物正面时,我完全沉浸于想象在那些有鼓起的旧墙纸的房间里,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说,从这些建筑物正面和门廊——古典的、现代的、折中的,连同它们的廊柱、半露柱和涂上厚厚泥

灰的神秘动物和人物的头像——从它们的装饰和支撑阳台的女像柱，从它们入口处壁龛里的躯干雕像，我所学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要比后来从任何书本学到的多。希腊、罗马、埃及——它们全都在那里，全都在轰炸期间吃了炮弹。从那条流向波罗的海的灰色、反射的河流和河流里偶尔一艘在急湍中挣扎的拖船，我学到的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要比从数学或芝诺那里学到的多。

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无关，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我就已经开始鄙视他了，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或实践——我七岁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如说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在的画像，这些画像充斥于几乎所有课本、所有教室墙壁、邮票、钞票等，描绘他一生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形象。有婴孩列宁，金黄色鬃发，看上去像一个小天使。然后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列宁，秃头、紧张，脸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表情可以被误解为任何东西，就说有目标吧。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征。（也许恰恰因为这张面孔没有任何特征，所以它暗示诸多可能性。）然后是稍老的列宁，头更秃，留楔形胡须，穿三件式暗色套装，有时候微笑，但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某辆装甲车上或某次党代表大会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只手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变体：列宁戴工作帽，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穿马甲，坐在书房里写作或阅读；坐在湖边树墩上，草拟他的《四月提纲》；或其他荒谬的户外活动。最后是列宁穿着一件准军事夹克坐在花园长凳上，旁边是斯大林，后者是唯一将要在无所不在的印刷画像上超过列宁的人。不过，那时斯大林还活力充沛，而列宁已经死了，仅仅是因为这点，

他便是“好”的,因为他属于过去——即是说,得到历史和自然的赞助。而斯大林则仅仅得到自然的赞助,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我想,学会忽略这些画像是我切断电源的第一课,我尝试疏离的第一步。接着还有很多;事实上,我的余生都可以被视为不停地在回避生命中那些最纠缠不休的方面。我必须说,在这个方向上,我走得颇远;也许太远了。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都变成一种损害,因而必须铲除。这包括文字措辞、树林、某些类型的人,有时候甚至包括肉体痛苦;这影响了我的很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得感激列宁。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视为宣传。我想,这个态度,演变成某种可怕的加速度,穿过各种事件的灌木丛,也连带伴随着某种肤浅。

我一刻也不相信性格的所有线索都可追溯至童年。约三代俄罗斯人都住在集体公寓和逼仄的房间里,我们父母做爱时,我们都假装在熟睡。然后是战争、饥饿,缺席或断手残脚的父亲,欲火中烧的母亲,学校的官方谎言和家中的非官方谎言。严酷的冬天,丑陋的衣服,在夏令营把我们尿湿的床单拿出来示众,以及在别人面前重提这类事情。然后红旗会在夏令营桅杆上招展。那又怎样?所有这些童年的军事化,所有这些胁迫性的愚蠢行为和性欲紧张(十岁时,我们全都对女教师想入非非)都没有对我们的伦理学或美学——或我们爱和受苦的能力产生太大影响。我回忆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潜意识很重要,当然更不是出于对童年的怀旧。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的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意识的真正历史,开始于人们的第一个谎言。我碰巧记得我自己的。那是在一个学校图书馆,那时我必须填写借书证。第五个空栏当然是“民族”。我七岁,很清楚我是犹太人,但我对服务员说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笑着说,你可以回家向父母问个清楚。我没有再回去那个图书馆,尽管我后来成为很多别的图书馆的会员,它们也都必须填写相同的申请表。我不羞于自己是犹太人,也不害怕承认是犹太人。在班级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和民族都有详尽记录,老师在课间休息时,总会时不时“忘记”教室书桌上那本花名册。于是,我们会像秃鹰一样,扑向那本簿子;我们班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七岁男童们都做不好反犹者。此外,按我的年龄计,我算是颇为强壮的,而那时最重要的还是拳头大小。我羞于“犹太人”这个词本身——在俄语里念作“耶夫雷”——不管它的内涵是什么。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不同的上下文,取决于其使用频率。在俄语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现的频率之少,如同美国英语中的“纵膈”或“狭巷”。事实上,它还拥有某种类似于四字粗口或性病名称的地位。七岁时,你的词汇量证明足以知道这个词的稀罕性,而把自己与它等同起来是绝对不愉快的;不管怎么着,它与你的音韵感背道而驰。我记得,我总是觉得“犹太佬”的俄语对等词——念作“zhyd”(发音与安德烈·纪德相近)——听起来顺耳多了:它显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无意义的,没有充满各种影射。在俄语中,一个单音节词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后缀或字尾或前缀,那些羽毛就会飞起来。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在那个幼嫩的年龄就因自己是犹太人而受苦;而只不过是说,我第一个谎言与我的身份有关。

这不是坏的开始。至于反犹本身,我并不太在乎,因为它主要来自教师们:它似乎是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消极角色不可或缺的,必须像低分数一样对待它。如果我是罗马天主教徒,我就会希望他们大多数人下地狱。确实,有些老师比另一些老师好,但既然他们都是我们当前生活中的主人,我们才懒得去区分他们呢。他们也不想对他们这些小奴隶作出区分,并且哪怕是最热烈的反犹言论也含有一种非个人的惯性。不知怎的,我永远无法认真对待任何针对我的口头攻击,尤其是来自年龄组别如此不同的教师。我猜,父母用来咒骂我的那些话,很好地锻炼了我。此外,有些老师自己也是犹太人,而我害怕他们一点也不逊于我害怕那些纯种的俄国人。

这只是自我修剪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自我修剪(再加上语言本身,在那里,动词和名词自由地更换位置,只要你有胆量这样做)在我们身上培养了一种如此强大的矛盾心理,以至于十年内我们的意志力就变得跟一根海草差不多。四年的军队生涯(男子十九岁就要应征入伍),完成向国家彻底投降的程序。顺从将同时变成第一和第二天性。

如果你有头脑,你肯定会设法智胜这个制度,包括发明各种绕道,安排与上司做隐蔽交易,堆积谎言,以及调动各种或明或暗的裙带关系。这将成为一份全职工作。然而你不断意识到你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网,并且不管你有多大程度的成功或有多大程度的幽默感,你都会鄙视自己。这正是该制度的终极胜利:无论你痛击它或加入它,你都同样感到有罪。国家信仰是——如同谚语所说的——没有任何恶是不含一点儿善的,而且可能相反亦然。

我想,矛盾心理是我国的主要特征。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刽子手

不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变成受害者,也没有任何最软心肠的受害者不承认(哪怕仅仅是对自己承认)自己有一种设法把自己变成刽子手的精神能力。我们当下的历史为两者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此中有某种智慧。你甚至会觉得,这矛盾心理即是智慧,觉得生命本身既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任意的。也许我们的文学如此瞩目地强调善,是因为善受到如此巨大的挑战。如果这种强调仅仅是双重思想,那就好办多了;但它使本能受不了。我想,这种矛盾心理,正是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的东欧集团,准备强加给全世界的“福音”。而世界似乎已准备好接受它。

撇开世界的命运不谈,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将是偏离轨道。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父母不允许,也因为你自己也很害怕那未知之数。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你不同于大多数人,而你从吃母乳开始就知道大多数人是正确的。一定程度的不在乎是必要的,而我就很不在乎。当我回想我十五岁辍学时,那与其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反应。我只是受不了我们班里某些嘴脸而已——某些同学的嘴脸,但主要是老师的嘴脸。于是某个冬天早上,没有明显的理由,我在上到半堂课时站起来,作我这次肥皂剧式的退场,穿过学校大门,很清楚自己再也不会回来。至于那一刻我最强烈的情绪,我记得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笼统厌恶感,厌恶自己太年轻,让那么多事情对我指手画脚。另外,还有那种模糊的快感,逃走的快感,望着满街没有尽头的阳光的快感。

最主要的方面,我想,是这种外部的改变。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约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同样是木嵌板、桌子、椅子——木匠们的乐园。同样是我们那些奠基者列宁、斯大林、政治局成员的肖像,还有马

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如果是在学校;或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如果是在审讯室。

不过,捷尔任斯基——“铁费利克斯”或宣传机器所称的“革命骑士”——也常常会装饰校长的墙,因为这个人已从克格勃的高处悄悄进入教育系统。还有我们教室那些拉毛粉饰墙,连同与眼睛齐平处的蓝色横纹,那蓝色横纹准确无误地贯穿全国,如同一条无穷的公分母线:在大堂、医院、工厂、监狱、集体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它的唯一地方,是农民的木屋。

这种装饰不仅疯狂,而且无所不在,而我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发觉自己机械地盯着这道两英寸宽的蓝纹,有时候把它当作海平线,有时候当作虚无本身的体现。它太抽象了,谈不上有任何意义。一堵墙从地板到与你眼睛齐平处,涂着老鼠灰或绿漆,而这道蓝纹就在它上面,蓝纹上则是处女般纯洁的白灰泥粉刷。没有人问为什么它会在那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它只是在那里,一条边界线,灰与白、下与上之间的一道分隔线。它们本身不是颜色,而是颜色的暗示,也许唯一能够扰乱它们的,就只有一些替代性的棕色块:门。紧闭的,半掩的。透过那半掩的门,你可以看见另一个房间,同样被分配了灰与白,中间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式的宇宙实在是件快事,尽管那个时候——或貌似如此——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拿五十换半百。我知道我想进入的任何其他建筑物,看上去都将完全相同,因为,不管怎样,建筑物都是我们注定要继续活动的场所。不过,我仍感到我必须走。家里经济情况很严峻:我们几乎是靠母亲的工资生存的,因为父亲在遵照某项认为犹太人在军队中不应拥有重要军阶的纯洁规定而退伍之后,一直找不到

工作。当然,没有我的贡献,父母也能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他们宁愿我完成学业。我知道这点,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帮助家里。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看上去要好些,况且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喜欢谎言,而喜欢谎言又恰恰是因为这个“几乎”——它锐化真理的轮廓:毕竟,真理结束于谎言开始之处。这就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而事实证明它要比代数有用。

2

不管是什么——谎言、真理,或最有可能的,两者的混杂——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我都对它怀着无比感激,因为这似乎是我的第一个自由行动。这是一种本能行动,一次退席。它与理性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点,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一直都在退席,且愈来愈频密。不见得就是因为沉闷或感到有一个陷阱张开大口;我常常退出完美的配制,一点不少于我常常退出可怕的配制。不管你碰巧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只要它有一点儿正派的痕迹,你都可以肯定有一天某个人会走进来宣称那是他的,或更糟糕,要你跟他分享。这时你要么为这个位置而力争,要么离开它。碰巧我更喜欢后者。绝不是因为我不愿力争,而纯粹是因为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想办法夺取某样吸引其他人的东西,表明你这个选择本身含有某种粗俗。至于你先得到那位置,这一点并不重要。实际上先占得某个位置更糟,因为那些紧跟而来的人永远拥有比你那部分地满足的胃口更强大的胃口。

这之后,我常常后悔我那个举动,尤其是当我看到以前的同学们都在体制内活得那么好的时候。然而我知道某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我也在出人头地,只不过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到某个更远的地方。

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竟然追上了真正处于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那时它还未开始朝着 50 年代末期的中产阶级转化。我在工厂打交道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时我十五岁，开始当一个铣床操作员。马克思会一眼就认出他们。他们——或者说应该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或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那样喝酒，互相争吵或在公共厨房内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暴死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哭流涕，而且满口粗话，其频率之高使得譬如“飞机”这种常用词会使一个过路人觉得是一种隐含深意的淫秽语——而在代表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而举行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

工厂全是砖砌的，庞大，直接来自工业革命。它建于 19 世纪末，“彼得”的居民都把它称为“军械库”：它生产大炮。我开始在那里工作时，它还生产农用机械和空气压缩机。不过，根据覆盖几乎一切与俄罗斯重工业有关的事物的那七重秘密面纱，该工厂也有一个代号：“671 邮箱”。然而我想，那秘密与其说是用来愚弄某个外国情报机构，不如说是用来维持某种准军事纪律，而这纪律是确保产量稳定性的唯一法门。不管是用于哪一面，失败都是明显的。

那些机器都是过时的；百分之九十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赔偿而从德国运来的。我记得那整座充满异国情调的铸铁动物园，那些动物都刻有辛辛那提、卡尔顿·弗里茨·维尔纳、西门子与舒克特等名字。计划都是可怕的；隔不久就会来一道要求生产某件东西的急令，这急令会使你好不容易试图建立某种工作节奏、某种程序的努力乱成